

中国文学通史



总主编 张炯 邓绍基 郎樱
本卷主编 杨镰

第四卷

元代文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NAN

元代文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通史. 元代文学 / 张炯, 邓绍基, 郎樱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399-5970-2

I. ①中… II. ①张…②邓…③郎…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元代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6588 号

书 名	中国文学通史·元代文学
总 主 编	张 炯 邓绍基 郎 樱
本 卷 主 编	杨 镰
责 任 编 辑	汪修荣 赵 阳 伍恒山
责 任 校 对	张松寿 汪成法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65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970-2
定 价	1080.00 元(全 12 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文学通史》总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 张 炯 邓绍基 郎 樱

编 委 王 飏 王学泰 扎拉嘎(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蒙古族)
巴莫曲布嫫(彝族) 邓绍基 邓敏文(侗族) 石昌渝
包明德(蒙古族) 刘世德 刘扬忠 刘跃进 刘魁立
关纪新(满族) 祁连休 严家炎 吴子敏 汤晓青
张大明 张中良 张 炯 连燕堂 陈晓明 杨匡汉
杨 镰 郎 樱 降边嘉措(藏族) 曹道衡 董乃斌
蒋守谦 曾镇南 陶文鹏 朝戈金(蒙古族)

秘 书 长 陶国斌

分卷主编 先秦至隋代文学 刘跃进
唐代文学 陶文鹏
宋辽金文学 刘扬忠
元代文学 杨 镰
明代文学 王学泰
清代文学 石昌渝
近代文学 王 飏
现代文学(上) 张中良
现代文学(下) 张大明
当代文学(上中下) 张 炯
少数民族部分 郎 樱

古代文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邓绍基

编 委 么书仪 王永宽 王学泰 韦凤娟 尹恭弘 石昌渝
巴莫曲布嫫(彝族) 扎拉嘎(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蒙古族)
邓绍基 邓敏文(侗族) 白少帆 白庚胜(纳西族)
李 玫 李少雍 刘亚虎 刘世德 刘扬忠 刘跃进
杨 镰 陈铁民 郎 樱 张锡厚 陶文鹏 曹道衡
董乃斌 蒋 寅 穆塔里甫(哈萨克族)

近现代文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炯

编 委 万平近 王 飏 包明德(蒙古族) 关纪新(满族)
关爱和 刘扬体 吴子敏 吴福辉 连燕堂 张大明
张中良 张 炯 张 韧 袁 进 黄淳浩 梁淑安
温儒敏 白 烨 古继堂 朱向前 刘登翰 刘锡庆
吴重阳 陈骏涛 陈晓明 杨匡汉 洪子诚 曾镇南
董之林 蒋守谦 蔡 葵 樊发稼

目 录

第一章 元代历史文化与文学·····	001
第一节 多民族统一国家元朝的建立·····	002
第二节 元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	008
第二章 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	017
第一节 杂剧的兴盛及其原因·····	018
第二节 杂剧的体制·····	022
第三节 杂剧的门类和内容·····	025
第三章 关汉卿·····	031
第一节 关汉卿的生平·····	032
第二节 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	033
第三节 关汉卿的婚姻、爱情剧·····	036
第四节 历史剧《单刀会》·····	039
第五节 关汉卿杂剧的特色和成就·····	041
第六节 关汉卿的散曲·····	043
第四章 王实甫和《西厢记》·····	045
第一节 王实甫生平和创作·····	046
第二节 《西厢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	047
第三节 《西厢记》艺术特色·····	053

第五章 白朴和马致远	057
第一节 白朴的生平和创作	058
第二节 马致远的生平和创作	062
第六章 前期其他杂剧作家	069
第一节 纪君祥和狄君厚的历史剧	070
第二节 康进之、高文秀和李文蔚的水浒戏	072
第三节 杨显之、石君宝、尚仲贤和李好古的婚姻、爱情剧	075
第四节 李潜夫、武汉臣、孟汉卿和王仲文的公案剧	078
第五节 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和艺人作家张国宾	081
第七章 后期杂剧作家	085
第一节 郑光祖的生平和剧作	086
第二节 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后期作家	090
第三节 钟嗣成和《录鬼簿》	097
第八章 佚名杂剧作家	101
第九章 前期散曲作家	107
第一节 散曲兴起和繁荣	108
第二节 卢挚、张养浩、王和卿	109
第三节 胡祇遹、冯子振、刘致	111
第十章 后期散曲作家	115
第一节 张可久、乔吉	116
第二节 睢景臣、刘时中	118
第三节 薛昂夫、贯云石、徐再思	121
第十一章 元代诗文(上)	125
第一节 元代诗歌发展的概况和特点	126

第二节	耶律楚材、刘因和姚燧等北方作家	129
第三节	方回、戴表元和赵孟頫等南方作家	136
第十二章	元代诗文(中)	143
第一节	虞集和“元诗四大家”	144
第二节	欧阳玄、黄溍、柳贯等散文作家	150
第三节	萨都刺、马祖常、余阙等西域作家	153
第十三章	元代诗文(下)	161
第一节	杨维桢和铁崖诗派	162
第二节	王冕和贡性之	167
第三节	张翥、戴良、王逢	170
第四节	顾瑛与玉山雅集	173
第十四章	元赋	183
第一节	概况	184
第二节	元前期赋家及作品	186
第三节	元后期赋家及作品	191
第十五章	元词	197
第一节	概况	198
第二节	元前期词	200
第三节	元后期词	207
第十六章	南戏	215
第一节	南戏的发展和流行	216
第二节	“四大传奇”——《拜月亭》、《荆钗记》、《白兔记》 和《杀狗记》	218
第三节	高明的《琵琶记》	222

第十七章 元代笔记与话本小说	227
第一节 元代笔记	228
第二节 元代话本	248
第十八章 《蒙古秘史》	265
第一节 成书年代与版本	266
第二节 作品的思想与文化内容	267
第三节 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273
第四节 作品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276
第十九章 蒙古族叙事诗	281
第一节 《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	282
第二节 《孤儿传》	286
第三节 《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	290
第四节 《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292
第二十章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297
第一节 故事梗概与流布地区	298
第二节 思想内容	300
第三节 艺术特色	305
第四节 艺人传承与文本流传	313
第二十一章 《萨迦格言》与藏族格言诗	317
第一节 《萨迦格言》及其作者	318
第二节 《甘丹格言》和《水树格言》	325
第三节 《国王修身论》	331
第二十二章 早期突厥语民族的英雄史诗	339
第一节 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	340
第二节 柯尔克孜族史诗《考交加什》与《艾尔托什吐克》	345

第三节	《先祖阔尔库特书》·····	349
第二十三章	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355
第一节	社会概况与文学综述·····	356
第二节	纳西族东巴祭祀经诗《祭天古歌》·····	357
第三节	纳西族悲剧叙事长诗《鲁般鲁饶》·····	366
第四节	大理“段氏总管”时期的诗文作品·····	374
第二十四章	傣族贝叶文学的繁荣·····	381
第一节	贝叶经与傣族文学的发展·····	382
第二节	阿銮故事·····	385
第三节	叙事长诗的勃兴·····	391
本卷后记	·····	398
卷后索引	·····	400

第一章

元代历史文化与文学

第一节 多民族统一国家元朝的建立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结束了自唐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由区域王国——宋、金、西辽、西夏、吐蕃、大理、高昌等——分立的局面。

蒙古族本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辽、金雄踞北方时期,蒙古各部落逐渐有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松散的部落联合。到公元一二〇六年(金泰和六年),蒙古各部贵族在斡难河源头举行大会,推举孛儿只斤部落领主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尊称“成吉思汗”,自此建立了奴隶制的蒙古国家。

据历史记载,元朝这个名称,正式出现在忽必烈(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在这一年,进入中原的蒙古皇室,才以“大元”为国家的名字。洪武三年(1370),由明朝官家史局修成的《元史》,实际上是将公元一二〇六年蒙古领袖铁木真(元太祖)于斡难河以“成吉思汗”为尊号,至元惠宗(元顺帝)放弃首都大都(即今北京市),回归蒙古草地(至元二十八年,1368),通称元朝。由成吉思汗于漠北建立大蒙古国,到忽必烈定国号“大元”,还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间有西夏、金的兴亡等历史事件,到南宋首都临安失陷而宋王朝告终,这一年已经是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距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有七十年之久。元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最终结束了南宋、西辽、西夏、金和吐蕃、大理等长期并立的局面。

高昌回鹘王国,早在成吉思汗四年(1209),就击杀西辽少监,率先归附刚刚崛起的蒙古。西辽和西夏,是在成吉思汗去世前就已亡国(西夏末帝宣布投降时,成吉思汗还在世,正式献城出降,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三天)。窝阔台汗(元太宗)时期,以长达二十多年的血战灭亡了宿敌金国。金亡后,窝阔台汗次子阔端,于元太宗十一年(1239)派兵进入吐蕃。吐蕃执掌政教大权的高僧贡噶坚赞,于元定宗元年(1246)到阔端驻地凉州,纳款归顺。到了蒙哥汗(元宪宗)在位时期,忽必烈率军远征云南,灭大理国。忽必烈称帝后,封吐蕃贡噶坚赞的侄子八思巴为国师,统领佛教,并管理吐蕃军民等世俗事务,最终将吐蕃纳入版图。忽必烈

称帝后,采纳中国历史上的惯例,先后以中统、至元为年号,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语义,建国号为大元。五年之后,攻下南宋都城,宋室覆灭。元王朝最后统一了中国。这半个多世纪的统一过程,也是由蒙古奴隶制国家,转化为元朝封建制国家的过程。

在蒙古攻灭金国过程中,北方原来的封建经济遭到破坏,发生过逆转现象,出现了奴隶制剥削关系。但蒙古贵族力求巩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他们逐渐改变征服政策,以适应北方原有的经济制度。早在蒙古军队攻下金朝的中都以后,成吉思汗授命木华黎为对金作战的全权统帅,木华黎采取了争取汉族区域武装的招降政策,并把以劫掠奴隶、财物为目标的掠夺战争,转变为争城夺地的占领战争。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北方一些有实力的汉族豪族武装和军阀纷纷归降蒙古,立场刚刚转变,马上被委任为原地地方行政长官。在他们的建议下,木华黎注意约束部下抢掠,保护农业生产,达到了他们保境安民的初衷。到了窝阔台汗时期,更加倚重金朝降臣和汉族区域武装的首领人物,在原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逐步建立适应中原封建制度的统治秩序,即实行“汉法”。窝阔台汗听取和采纳了曾为金臣的契丹王族之后耶律楚材的意见,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经济的政策、措施。当有的蒙古贵族中人向窝阔台汗提出,把农田纷纷改为牧地的主张时,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支持下,阻止了一场对农业经济严重破坏的倒退浩劫。同时,耶律楚材建议制止和约束战争过程中对无辜百姓的大规模屠杀行为,使之安居乐业。他还力争将蒙古诸王大臣所得的“驱口”(战争期间沦为奴隶的无辜百姓)和汉族军阀、武装地主占有的奴隶,改籍为国家编氓,这些奴隶对农业生产是无可替代的劳动力。他还在北方推行著名的轻税薄赋的“五户丝制”。凡此等等,都有利于保护地区农业经济,使之免遭更大的破坏,并逐渐得到恢复发展。

在进攻金朝的战争中,蒙古军队不注意保护儒士,在一个时期内,儒士被奴役乃至遭到屠杀的现象较普遍。在攻城夺地过程中文化典籍也受到损失。金亡前一年(天兴二年,1233),著名诗文家元好问致函耶律楚材,要求保护儒士。经耶律楚材坚持努力,窝阔台汗时期,改变了对儒士的政策。耶律楚材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搜集和保存儒学、文化典籍。他还奏请窝阔台汗批准任用儒者为课税使,仅一次就起用了二十人,这是蒙古王朝大批任用儒士文臣的开始。窝阔台即汗位后第十年(1238),实行第一次以儒术取士,即著名的“戊

戌选”。窝阔台汗去世以后，脱列哥那皇后摄政，排挤主张实行“汉法”的官员，耶律楚材不久就去世了。

但到了忽必烈时代，出现了新的势头。

忽必烈是元宪宗蒙哥汗之弟，蒙哥即汗位后，任命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军政大权。在这以后的十年间，在忽必烈周围形成了一个儒士幕僚集团，其中有些骨干，正是戊戌年中选的人。他们有的人向忽必烈进言“崇儒重道”，并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代圣君贤臣事迹，有的人向他陈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农桑天下之本”和“三纲五常”等道理。他们力图使忽必烈接受和实行中原封建文化和制度，实际上又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忽必烈则通过这些有影响的儒士来争取汉族地主、军阀和士大夫对他的支持。在忽必烈受命掌管汉地军政大权的次年，即宪宗二年（1252），奉忽必烈命访求人才的张德辉偕元好问北觐，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在部分蒙古宗王拥戴下，依靠汉族儒士谋臣和军阀将领的支持，打败了汗位的竞争者。自此，忽必烈进一步信用儒臣，更加坚定地实行汉法。他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按照历来中原封建王朝传统，自称皇帝，建立年号，以后又更改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明白地宣告，他是中国历代王朝正统的继承者。

大体上说，到忽必烈正式建立大元王朝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从成吉思汗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封建国家的转变过程，忽必烈已不仅是蒙古贵族，同时也是北方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因此，由他完成的灭宋战争基本上已属于地主阶级之间的统一战争。

由元王朝成为封建国家的性质决定，在灭宋以后，江南地区的封建经济没有像灭金过程中北方封建经济那样遭到很大破坏，而是基本上保存下来，南方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基本上受到了保护。忽必烈又很快采纳了程钜夫的建议，起用南方儒士为朝臣，并专门委派程钜夫到江南原南宋区域，寻访遗贤，并举荐给朝廷。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是起用宋室后裔、著名文士赵孟頫，这样，南方地主阶级对元王朝的态度也由反抗逐渐转变为拥护。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年间及以后，更多的原先持不合作乃至敌对态度的南方儒士纷纷转变态度，出仕新朝，食奉禄，担任职务。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南方地主阶级对元王朝统一中国的最终承认和拥戴。

从国家制度上来说，元朝基本上沿袭宋、金旧制，同时也保存了蒙古的某些

旧制。处于元王朝统治下的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及西北、西南诸民族,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有元一代,究心儒学的蒙古族文士虽逐渐增多,但范围还是有限。蒙古贵族中也大抵还保留着原来的文化、风俗习惯,以和林为中心的岭北行省和广大草原地区,更是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特点。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文化则继续沿着原有的封建文化传统发展,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正统儒学依旧是文化上的统治思想,在宋代形成的理学不仅继续流行和发展,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官学。这又是元代封建文化继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从元代前期开始,儒学官员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加,这成为元代的文化特征,深刻影响了元代历史发展进程。

元朝统治者在中原(即在原宋、金统治的南方和北方)地区采用并实行“汉法”,把理学定为官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也获得汉族士人的认同,后来元朝灭亡之际,不少汉族士人坚持忠于元室,入明后有的还坚持遗民立场,他们在行动和创作中表现出的忠于故主的情绪也十分强烈,并不比早先的宋遗民逊色,这正是对元朝基本国策认同的明证。但元朝实行的若干政策,带有明显的地域与民族的区分印记,确实又曾招致汉族士人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有元一代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之一,是后世史家长期议论的话题,但正是这种情绪不但推动了元代文化的发展,也为元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色泽。

元代一项重要的国策,就是将其治下的人群分作四个等级,并因此实行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举措。这个举措同样是时人与后人的关注议论点,同样也为元代文化与文学设定了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曾出现过的)背景。

作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元朝有利于并且实际上也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但在封建统治下,各民族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历代封建王朝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公开地把人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蒙古,是元朝的主体民族。色目,是来自西域等中华文明固有的文化圈之外的不同信仰与种族的人群。汉人,特指原来在金朝之下的居民,以及北方的一些民族,其中有汉族、女真族,也有渤海、契丹等民族。南人,以南方的汉族为主,还包括其他世居江南的民族。实际上,这四个组群等级的划分,就是从蒙古过渡到元这一历史过程所包容的民族成分。

元朝政府在许多中央机构、行省以下的大部分行政机构,是实行蒙古、色目

为右族，汉人、南人为辅助的统治模式。地方机构，设立达鲁花赤一职，这是元代历史的特点，达鲁花赤（含意是断事官）一般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在路、府、州地方机构中，除以蒙古人任达鲁花赤外，又以汉人为总管、府尹和州尹，色目人为同知。达鲁花赤在地方官中地位最高，即使不实际理事，也成为位居首位、有决断权威的官员。此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规定南人不得任省台之职，南人即使考中进士，也不能为御史、为宪司官、为尚书。这种现象也必然在汉族儒士中引起不满与不安。

元朝初期，废除了历行十余世纪的科举制度，正式恢复举行科举取士制较晚，已经是元仁宗延祐初年，而且时行时止。即使科举实行的年代，由于科举制本身存在着不利于汉族士子的规定，如名额由四等人分配，实际上不利于参与科举人数众多的汉族士子。总的来说，元代每科的进士名额，远远少于唐宋。元代还有两举不第，恩授教授、学正和山长之例，却又曾经规定汉人、南人的年龄限在五十以上，而蒙古、色目人只限三十以上。此外，在出试题和限字数等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利于汉人、南人的规定。

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在儒士中也引出了不满。元统元年进士及第的色目人余阙在《杨显民诗集序》中说：

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缙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

科举未行之前，儒士通常只能由吏入仕。儒学官职，是仅有的例外。除特殊情况下，由吏出身者可跻要员，受显爵外，一般都要经过漫长的坎坷仕途。科举制实施以后，吏员出职制度依然保留，这从元朝政府来说，是仕进有多途政策的体现，也有保证吏员质量的用意。实际的结果又使元代的吏比唐宋时代吏的地位显得重要。但对于大量的要经历由儒充吏再“入流”为官的元代儒士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改变。自唐代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后，儒士仕进的机会更多了。大致也是在唐代科举盛行以后，州县小吏的地位更低了，他们甚至被明文规定禁止参加进士试。这种传统的观念，致使元代一些儒士不愿为吏。

元末王冕曾试进士举，不第，但当他听说他的朋友李孝光要推荐他作府吏时，立即骂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这种坚持正統的儒为“四民之首”的价值观念的人，不屑为吏，当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仕进的机会。而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了吏途的儒士，往往老于刀笔，一生沉抑下僚。

吏员出职制，是仕进多途政策的一种表现。元朝仕进多途，也有很多弊端。元顺帝后至元元年，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为了反对中书平章政事撒里帖木儿议罢科举，和太师伯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许有壬说：

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

在这里许有壬说的“白身补官”范围宽广而复杂，据《元史·选举志》，“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这里“投下”指由奴隶转化来的奴仆供役之人，即所谓隶卒，或者是诸王贵族占有土地所属的“投下户”，所以《选举志》中又载：“而舆隶亦跻流品。”这样的“仕进多歧”，与儒士的传统价值观念必然发生冲突，从而引出愤懑，元末李继本《一山文集·与董涑水书》中记录的一则俗谚说：“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反映。

与唐宋相比较，元代儒士的地位在实际上有所变化，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朝法律规定“九儒，十丐”，于史无徵，但这种说法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危机与人心向背。同样，忠于元朝，并在抗击起义军时为元王朝殉难的色目人余阙说的“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也是这种社会危机的反映。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为儒生地位、境遇而发的不平之鸣和抨击之音，异常强烈，在程度上超越了前代作品，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其实，元朝文学作品之中表露出的强烈的隐逸情怀，则是文人出路不畅这种社会情绪的反弹。

元代社会存在的儒士定位，实际上是一种信任危机，而且这对文化、文学的影响，并不总是消极的。据《析津志》记载，关汉卿正是在“文瀚晦盲”之时，“淹于